

#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张起 著

Deconstructing the  
American Paradigm of  
IR Theory

国际政治哲学

解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张 起 著

---

Deconstructing the  
American Paradigm of  
IR Theory

## 国际政治哲学

---

解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哲学:解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张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097 - 7774 - 9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国际关系 - 研究②美国对外  
政策 - 研究 IV. ①D81②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7116 号



国际政治哲学  
——解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

著 者 / 张 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长香

责任编辑 / 曹长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774 - 9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反思主流 IR 理论范式的美国性 .....	10
第一节 问题：何谓 IR 理论的“美国范式” .....	10
第二节 回应：何谓“国际政治哲学” .....	16
第三节 “美国范式”的三大传统概览 .....	20
第二章 为何需要“国际政治哲学” .....	33
第一节 全球化：“美国范式”的历史语境 .....	33
第二节 从 IR 理论范式的分类方法看“美国范式” .....	38
第三节 “国内类比”：两种国际政治哲学的困境 .....	50
第三章 “美国范式”的方法论审视 .....	64
第一节 IR 研究中方法论对本体论的优先性 .....	64
第二节 方法论的唯理主义与方法论的建构主义 .....	65
第三节 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 .....	88
第四章 “美国范式”的本体论反思 .....	107
第一节 “美国范式”隐含的本体论问题 .....	107



第二节 国际政治本体论争议的审视、反思和定位 .....	113
第五章 “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定位 .....	165
第一节 国际政治的“知识”与认知方法反思 .....	165
第二节 从基础主义到融贯论 .....	175
结语 展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 IR 理论中国范式 .....	200
参考文献 .....	203

## 导 言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研究学界逐渐从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即“IR理论”）的关注和讨论中走了出来，转而聚焦那些通过短期研究即能取得立竿见影成效的外交政策议题。这似乎暗示了中国的国际研究有丧失“理论志趣”的趋势，也似乎暗示了相关学界陷入引介和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瓶颈期。甚至不无讽刺地说，如果今天还有谁批判性地探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或者试图在“中国范式”上做文章，谁就不免有“不识时务”之嫌。诚然，过去十几年来，国内相关学界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性研究，多是引介、综述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西方学者相互间的批评，即使所谓基于中国视角的反思，其所聚焦的仍然是西方主流范式语境所预设的几个问题，如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否必然、国家中心主义是否应被放弃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还是合作，等等<sup>①</sup>。然而，围绕上述问题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内部之争，它们之间不论怎样相互批评也不会超越以“美国范式”为代表（如自由制度主义、自由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等）的体现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于是，这种看上去尖锐的“自我批评”活动，实际上增强了这些主流理论体系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和强强联合，即通过一系列“范式搭桥”或“理论折中”的尝试，实现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共同体的扩大再生产

---

<sup>①</sup> 这类研究著作在国内学术出版物中屡见不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可参见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和“范式帝国主义”的自我强化。所谓“范式搭桥”，如萨穆尔·巴尔金（J. Samuel Barkin）等学者主张的在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之间搭桥形成的现实建构主义（realism constructivism）<sup>①</sup>。所谓“理论折中”，如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提倡的以“问题为导向”（issue-oriented）的分析折中主义（eclecticism）<sup>②</sup>。在此意义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的任何相互批评最终都演变为对上述“范式帝国主义”的辩护词。

进而言之，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在国际研究领域中的体现，带有浓厚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色彩。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政治科学”一词虽然在能指层面上冠以“科学”的帽子，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指层面上就是一门真正具有因果关系解释能力的科学。我们一旦使用“政治科学”这一符号，则“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暗示了某种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含义：正如美国知名政治学学者迈克尔·G. 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s）所著经典教材冠以“political science”之名<sup>③</sup>，而不是“politics”，这是在字面上强调采用“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政治学的含义。与之相比，物理学（physics）、化学（chemistry）和生物学（biology）等的“学科定义”无须多此一举，这恰恰表明“政治科学”本来不是一门科学，只是一种试图通过提出“因果解释”（即华尔兹所指的“理论”）、描述客观规律、强调模型可预测性等元素构造起来的特殊政治研究路径，它本来不应该含有任何普世化的特征。进而言之，该路径在研究形式上凭借科学的“无情特征”（如实证的、统计学的、可计量的，等

① [美]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② 详见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5, 2003, p. 235。

③ “政治科学”研究传统从其产生根源上讲，是受美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表现为追求客观描述研究对象并且剖析对象背后潜在的因果关系的所谓“实证研究”进路。

等) 意图实现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学”。它实际上隐藏了不容忽视的“去反思化”的理论效果, 因为在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透镜下, 任何被研究的对象(在政治科学中就是政治现象) 都是主体无涉、价值中立、超历史性的(transhistorical), 它们的本质是稳定的、不变的、自在的, 并且它们在你面前所呈现的似乎就是外在于主体而绝对给定的, 这意味着你只能去“客观”描述它, 去接受它, 并且因循其“内在规律”去再生产它。例如, “政治科学”通过描述资本逻辑的因果机制以及刻画该逻辑在历史延展中的可预测性的方式<sup>①</sup>, 从而最终使得研究者手持华尔兹式(waltzian) “理论”<sup>②</sup> 的入场券参与到现代世界体系的秩序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再生产中。这实质上是“解构”了政治学(含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反思、批判的理论向度, 并且掩埋了社科理论中应有的“解放性”的左翼特质。换言之, 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科学”自我投射出了符合其世界观的世界图景, 所谓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描述以及科学预测事态进程也只是在它已经预设好的重言式命题(tautologies) 中展开, 无论是“经验证实”(empirical positify) 还是“经验证否”(empirical fasify), 都不自觉地达到了对现存世界经济秩序及相应全球治理模式的理论强化。

一向标榜自己具有对政治、社会事态预测能力和客观因果关系描述功能的美国社会科学传统(即“政治科学”路线), 正是这样一种“去政治

---

① 在某种程度上, 著名的“李普塞特命题”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均可视为“政治科学”研究路径的典型成果。

② 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或“美国范式”中表现出的“理论”不应想当然地理解为通过科学观测研究对象得出的客观描述, 而实质上是一种独立于真实世界的“主观建构”, 它的合法性来源于“有用性”, 更直白地讲就是对确立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的效力。一旦某种 IR 理论能对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实践产生影响, 甚至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机制建构作用, 这种“理论”就不啻在真实世界投射了一幅依据“理论”自身范畴描摹的图画。具体对“理论”的解释可以关注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第一章“规律与理论”中论证的理论与规律的区别, 认为前者是对规律的解释, 后者是对事实的观察, 但规律本身无法说明某种联系是否存在, 也就无法说明能否进行控制和如何控制。因此, 在笔者看来, 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政治科学”解释只有在主观建构的“理论”中才具有合法性。



化”的“学术政治”产物。“去政治化过程”本身又是一种有特定立场或特定观点的“再政治化的过程”。国际关系学作为形成历史不足百年的社会科学新成员，恰恰是伴随这一“去政治化过程”成长起来的，同时在“再政治化过程”中被漂染上美国价值观体系的肤色，彰显出鲜明的美国式科学主义思潮的基调：无论是属于国际关系“显学”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sup>①</sup>通过“理论”构造来推演其国际无政府结构，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运用经济学的市场类比和策略逻辑（the logic of strategy）对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单位行为模式的解读，均体现了英美科学主义方法论<sup>②</sup>的研究路径以及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哲学传统。即使是对以上理论体系持批评态度的社会建构主义，也试图选择一条在“理性主义”（以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为典型代表）和“反思主义”（reflectism）传统之间的“骑墙主义”路线，以确保自身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共同体（即“美国范式”）中不被边缘化。国内学者不无指出，从事上述范式研究的西方学者在其表述中均涉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社会结构等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力与美国所处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而其理论形态和背后的观念则与美国民族历史、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等大有关联<sup>③</sup>。在此意义上，这种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本质上是其本国历史传统、经济、政治活动和外交政策经验的反映和理论抽象。一般而言，通过本国经验形成的理论范式自然带有地方性质，并且在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实践过程中，往往促使国际行为单位完全站在自身利益角度上制定政策和塑造国际机制，试图将其特定传统（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投射于全球范围内，即特殊主义的普世化（particularism universalization）。

①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在同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比较的意义上，也被学界称为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② 本书第三章将此“科学主义方法论”在国际政治哲学语境中诠释为“方法论的唯理主义”或“理性主义方法”。

③ 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美国性”问题的内在逻辑，在根源上滥觞于现代世界体系<sup>①</sup>背后的**资本的逻辑**，它本质上难以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政治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内核与前提假设中蕴含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均不同程度地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换言之，它们在建构自身理论体系以及解释国际关系事实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西方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作模式进行合法性辩护，为资本主义大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战略实践提供理论论证，开辟国际舆论道路。进一步讲，当代新现实主义范式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后威斯特伐利亚时期”的霸权稳定状态）的绝对性和体系结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先验本质，并坚持一种从先验理论假设出发来研究国际政治现实的经验实证主义的路径，并且将“国家”这个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单位视为超越历史的（transhistorical）存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虽然强调国际进程和规则，但仍旧在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类比”等核心假设和采用“科学—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方面同新现实主义并肩而行，暴露了其不是从历史实践出发、基于问题导向，而是过分依赖形式理论、囿于范式导向（paradigm-oriented）的形而上学特点。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范式在批判性地吸收前二者的基础上，试图持有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同时坚持认识论上基于主体经验<sup>②</sup>的科学实在论的基调。值得强调的是，以上“美国范式”都从不同方面“立场坚定”地拒斥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国际政治研究，如将列宁的帝

---

① 可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② 西方社会科学中所强调的“经验”（empirical/empiricism）有其科学哲学基础，通常可追溯到英国的经验论传统。在此哲学背景下对国际关系事实观察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主观属性，而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经验”。这意味着要摒弃一种国内学者（包括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学者）通常的误解，即从字面上理解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经受了事实检验的“真理”，是绝对客观的。实际上，“经验”在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语境中是一种主体性的范畴，它提供的观察记录不必然蕴含因果解释，需要“理论”来构建因果联系（可参考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第一章中的观点）。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验实证等同于真理符合论。

国主义理论贬损为忽视结构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sup>①</sup>，以及明确否定生产关系作为唯物史观的范畴，相反，将它视为观念或文化范畴<sup>②</sup>，这清晰体现了其唯心史观的本质。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要冲破“美国性政治科学”雾霾的笼罩，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层次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不能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有力的批判武器，当然更少不了政治哲学视角的介入。在批评和反思的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范畴（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交集——国际政治的哲学理论或“国际关系的元理论”（meta-theory of IR）将成为一种在理论上可能并且在实践上需要的跨学科的理论尝试。进而言之，本书试图站在“元理论”的高度去审视、定位和反思上述 IR 主流范式，并利用跨学科交互研究的工具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作为一个“美国范式”的整体，按照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等范畴进行反思性“解构”，最终旨在在“美国范式”的疆域内为未来的“中国范式”清理出生长空间。

正是在此视角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将按照以下五章展开。

第一章首先从反思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美国性”出发，指出其本身具有的地方局限性会导致特殊主义普世化的问题和“范式帝国主义”，并且通过分析“美国范式”的嬗变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揭露“范式帝国主义”背后蕴含的西方国际政治价值观和特殊秩序的普世化威胁。其次，为回应上述威胁而提出“国际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以审视、反思及定位“美国范式”背后的“元理论”基础，这可谓一种对“美国范式”的解构性剖析，属于相对独立的批判。再次，本章对“美国范式”包含的三大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了简单素描和点评，旨在为后面的“哲学分析”圈定靶向治疗的目标。

第二章则首先分析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产生背景的全球化语境，

① 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1～28页。

②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6页。

对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含义及其类型从不同层面进行界定和划分,在此基础上锁定“美国范式”的分类结构形态和批判的范围。其次,对当代两类国际关系的哲学思考(自由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合理性展开反思,即驳斥将其作为普世化的国际政治哲学的必然路径,从而为本书提供的研究路径清理理论障碍。其论证特色有二:一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类型划分,尝试运用“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的三个传统划分的分析模式,并以其蕴含的“国内类比”逻辑为红线,展开本章之后部分对“国际政治哲学的国内类比路径”的批判;二是本章批判性地将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的政治哲学原则、观点等诠释为马丁·怀特式的“国内类比逻辑”,同时以类似逻辑批评另一种霍布斯式“丛林类比”的国际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

第三章的研究主题从作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方法论角度展开审视,将这些方法论划分为“理性主义(或唯理论)&建构主义”以及“个体主义&整体主义”,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它们的内在肌理和问题等进行剖析,并指出其中蕴含的唯心史观的方法论表现。具体言之,本章结构设置不同于一般教科书式的论证次序,即把本体论分析置于方法论研究之前,而是首先从对“美国范式”的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分析入手,并针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特殊语境给予合理批判性分析。值得强调的是,本章尝试运用INUS条件<sup>①</sup>模型对方法论理性主义或唯理论(rationalism)的因果解释模式按其自身逻辑进行解构性的分析。此外,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一节试图剖析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驳斥方法论还原主义的论证逻辑<sup>②</sup>,指出他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批评为“还原主义”的错误。

① INUS条件是指“不充分的(insufficient)、必要的(necessary)、不必要的(unnecessary)和充分的(sufficient)”几种条件,具体根据INUS条件对方法论唯理主义的内在逻辑问题的揭示将在本书第三章中展开。

② 可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1~28页。

第四章从考察“美国范式”中潜在的本体论问题入手，指出其“美国性”的形而上学根源。进而言之，本章试图通过聚焦温特关于国际关系事实的界定，为读者揭示蕴含于“美国范式”中的当代语用学（pragmatics）基底的本体论立场。本章最后部分尝试援引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观点对上述立场进行“矫正”。值得强调的是，本章援引当代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关于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的本体论思想<sup>①</sup>，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进行“元理论”层面上的定位。此外，本章试图在温特的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建构进路、塞尔的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进路以及卢卡奇的社会总体性存在的思想之间展开“对话”，从而揭露建构主义蕴含的唯心史观的立场。

第五章将对“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基础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定位。本章首先通过对国际政治“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引发对主流范式中隐藏的认识论基础的进一步思考，即通过尝试利用知识论范畴中的基础主义和融贯论观点，围绕相关主流范式语境对其背后所谓“政治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展开批判性定位。并且，本章通过这种定位工作将以上认识论定位诠释为具有实用主义（pragmatism）色彩的“基础—融贯论”，即综合折中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路径，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伪科学实在论”（pseudo-scientific realism）。

从全书整体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由于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基本范畴的跨学科交互研究，因此其论证手法多以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基本范畴为框架，来解构、吸收、整合国际关系理论、政治科学和相关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这种不同层次的交互研究，不仅包含低阶的“部门理论”和高阶的元理论这两个层次间的对话，而且还要求在每个层次内部展开跨学派、多视角的对话和比较。例如，读者将在第三章对“美国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中看到从方法论理性主义角度对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

<sup>①</sup> 约翰·塞尔（Jhon R. Searle）在继承了英国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语用学分析方法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实在的建构理论。

六个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唯理论（rationalism）的“转译”；而在第四章对国际政治事实的本体论反思中，则为读者揭示一幅在当代语用学的分析哲学研究、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进行的多学科、跨学派的交互研究的图画。以上研究方法新路径在其他各章节也有所表现。

总之，本书以“国际政治的哲学理论”来解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试图告诉读者：它作为试图突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瓶颈期”的一次跨学科尝试，旨在为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的话语体系，提供一种元理论层面上崭新的研究路径。

# 第一章 反思主流 IR 理论 范式的美国性

“英语国家最擅长以普天下人民的福祉掩盖他们自私的民族利益……此类伪善在盎格鲁—撒克逊式思维中极其典型，是其独一无二的怪癖。”<sup>①</sup>

——〔美〕E. H 卡尔

## 第一节 问题：何谓 IR 理论的“美国范式”

美国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直言不讳地将国际关系学视为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sup>②</sup>。作为发展历程不足百年的社会科学新成员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简称“IR 理论”）或多或少地具有美利坚的血统，尤其是被国际关系理论界公认为当代主流范式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无一不是诞生于美国。甚至上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特点已经造成相关理论范式发展的路径依赖。进而言之，以上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在本质上是美国历史传统、国内经济政治活动和外交政策经验的反映和理论抽象。而基于本国相

---

① E. H 卡尔著《危机 20 年》（1939），转引自〔美〕查莫斯·约翰逊著《帝国的警钟：美国共和制的衰亡》，周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 52 页。

②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No. 3, Summer 1977, pp. 41–60.

关经验形成的理论范式当然带有地方性局限，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往往站在自身民族—国家利益角度上制定对外政策或塑造国际机制，并试图将其特定传统（如美国的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标准投射到全球范围。

具体言之，读者不难发现如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嬗变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20世纪中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确立的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sup>①</sup> 可视为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权力光芒在 IR 理论范式上的投射结果<sup>②</sup>。伴随冷战的来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了论证美苏两极世界的内在结构的稳定性，以诸如威慑、理性选择理论（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等“政治科学”的方法取代了经典现实主义从抽象人性出发的形而上学的路径，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美国的全球霸主身份提供合法化的理论外衣，从而论证美国作为极化世界的超级力量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稳定世界秩序，以防“苏联独裁势力涂炭全球”。当世纪的战车挺进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时，美国遭遇了自罗斯福新政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实现经济复苏以来的漫长的经济滞胀<sup>③</sup>，美国面对这一窘境进行了经济政策的又一次大胆的转折性调整，放弃了注重国家宏观调控和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管控的凯恩斯福利主义道路，而回归到一种更强调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模式，即所谓的“新古典经济

① 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思想可见于其代表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以及更早时期出版的《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中。

② 美国在当时的（以GNP为核心的）物质性权力几乎占到全世界同类权力指标总量的半壁江山，有历史数据为证：“从经济方面说，它虽只占有全世界6%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却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量的2/3，外贸出口额的1/3，黄金储备的3/4；生产资本主义世界1/3的小麦，1/2的棉花，70%的玉米；开采62%的煤和石油，冶炼61%的钢；生产48%的电力和84%的汽车；拥有全世界84%的民用飞机，85%的冰箱和洗衣机。1947年6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感慨地说，美国‘今天正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全世界财富约30%，而今天，美国则掌握大约50%’。”详见托马斯·佩特森著《美苏对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第11页，脚注41。转引自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2000》，《美国通史》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1~12页。

③ 该轮经济滞胀的直接导火索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性石油危机。



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政策。它强调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路线，即基于行为体市场互动所形成的调节机制，以看似自由民主的市场制度取代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大社会、小政府”的治理路线。相对于这种国内经济实践背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受其影响的外交政策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即不得不接受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绝对权力优势的日趋式微和国际地位的逐步下滑，转而又通过相关理论和实践强调在充满“多极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构建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尽管采取隐晦和技术性的表达范式）。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能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立足的现实根源，其实质是美国国内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的“国际版本”——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几乎是同一时期，现实主义范式也为适应这种变化而对其经典版本（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形而上学内核进行了彻底改造，强调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先天（a priori）地位和外生性（exogenous）角色，这也是为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或去中心化的现实图景。无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等理论范式，在本质上都是为适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为美国打造“隐形帝国”的霸权机制提供理论论证和思想资源。此外，即使是有着浓重反思主义或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味道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其诞生背景也是基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随着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对抗的消失以及世界多极均势的稳定发展，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式的你死我活的“敌友划分”不再终日盘旋于思考国际关系的学者、政客的大脑中，转而诉求一种能展现“新思维”的 IR 理论范式，以能够从学理层面上推动塑造今天的“民主化的国际社会”及其成员（民族—国家）的美国性的身份特质，即有利于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化文明”的身份认同的研究进路<sup>①</sup>。例如，建构主义

<sup>①</sup> 王义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的思考对笔者很有启发。相关详细论述可参见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